

出席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四十周年纪念大会暨学术讨论会

〔论文〕

八年抗战中的国民党战场

四川大学 李安华

一九八五年五月

八年抗战中的国民党战场

李安华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共同领导的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个重要战场，在打败日本法西斯、夺取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战斗中，中国人民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中国人民在亚洲的东方，最早开辟了反对法西斯侵略的中国战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对于这个问题，战争期间，中外著名的政治家都有明确的论述。

毛泽东说：“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这个战争，在东方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历史上也将是伟大的，全世界人民都关心这个战争。①”

邱吉尔曾经指出：“日本的资源是一种消耗性因素，由于在中国进行的消耗巨大的战争，这个国家已经长期处于过渡的紧张之中。”又说：“我必须指出，中国一崩溃，至少会使日军十五个师团，也许会有二十个师团腾出手来。其后，大举进犯印度，就确实可能了。②”

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也指出：“我一贯主张使中国发展成为支援我们在太平洋前进的根据地。由于战局变得更加有利，因此，从中国方面获得应有的援助，在时间上是显得越发紧迫了。③”罗斯福还指出：“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打垮了，你想想将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劲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夹攻，在远东会师，把俄国完全孤立起来，吞掉埃

及，切断通过地中海的交通线。④”如果真是这样发展，那么，世界的整个形势将是另外一个模样了。

当时，共产国际也曾经指出：“伟大的中华民族起来反对野蛮的暴力，不仅是为保卫自己的国土，保卫自己的自由与独立，而且也是为保卫全人类的和平事业，假使日本法西斯军阀，突然地征服了中华民族，那么，它将在亚洲，在太平洋，在欧洲，在世界其他各地，大大加重与发展法西斯主义的侵略。而中国之胜利，都正是对一切法西斯侵略者的掠夺之计划之严重打击。所以，中华民族的解放战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及整个人类反对野蛮法西斯主义暴力的总斗争中之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⑤”

遗憾的是，自战争结束以来，国外出版的一些战史著作，特别是西方（包括日本）的有关战史著作，往往没有如实地反映历史，要不就是只用少得可怜的篇幅轻描淡写地把中日战争一笔带过，甚至有些著作对中国战场进行了粗暴的歪曲和恶意的贬低。

著名的英国军事理论家，历史学家和传记作者巴兹尔·亨利·利德尔——哈特，他花了二十年时间，著了一部长达百万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对中国战场只字未提。

法国著名二战史专家，亨利·米歇尔教授，在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一书中，说什么“中国人没有能力防卫自己，只能弃城向内地撤退。⑥”还说什么，“光靠自己，中国是无力赶走日本人的。⑦”“在中国境内战争几乎停了下来，理论上包括12个师的一个中国集团军，甚至不敢去攻击一个分散在很长战线上的日军师⑧”

美国学者约翰·亨特·博伊尔，在其《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中，说什么，“正是共产党煽动中国人民激起一种主要指向日本的排外主义的浪潮，并且鼓励国民党对日本进行毫无用处的抵抗。”

而把他们自己的军队完好无损地保存起来。⑨”

另外，苏联科学院主编的《世界通史》第十卷上下册，全书共数十万言，但它只用了十多页的篇幅来描述中日战争，说什么，

“中国的统治者懂得，在已经形成的各交战国力量对比的条件下，他们在对日作战的战场上，不用作任何军事努力也能成为战胜国的一员。⑩”在评价解放区人民武装的作战能力时，说什么，“虽然到了一九四五年春解放区的正规军已发展到90万人，民兵发展到200万人，但是人民武装力量还没有能力开始与日军决战，以解放大城市，占领铁路线。⑪”在论及到国民党军队时说：“国民党军实际上在战场上毫无作为。⑫”苏联学者索洛维约夫胡说什么，

“中国共产党……不去反抗日本军国主义，而是积蓄力量进行反对国民党的战争。⑬”

还应当指出，台湾出版的有关著作，也存在不少严重的问题，说什么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方针是“一分抗日，七分壮大，二分来应付国民党。⑭”甚至称共产党为“匪”诬蔑八路军、新四军“制造摩擦进攻国民党军”，“破坏抗战”⑮。这当然不是真正的历史研究。

归纳起来，歪曲和贬低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言论，实际上表现为两个问题：首先是贬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在中国抗战中的主要地位，同时，对国民党正面战场也缺乏实事求是的估计。

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大致有三。一、西方学者以因方为中心的
错误历史观点，强调大国主宰世界，强国决定世界历史命运，根本否认东方被压这民族在世界历史上的作用。他们惯于从本国的立场出发，为自己歌功颂德，夸大自己的作用，而贬低中国和第三世界

各国的作用；二、台湾著作对国民党战场的浮夸、对解放区战场的贬低和恶意攻击。尽管这种不科学的浮夸和超出历史研究的恶意攻击，不但不是真正的科学，也违反了国民党在抗日战争前后的一些著作中的比较客观的观点和提法，但是，它毕竟影响了西方的一些著作家。三、新中国早期的有关著作，强调解放区战场的主要作用是完全正确的，但同时往往忽视国民党战场的作用，这也不能不影响到对中国全面全民族的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巨大作用的充分的全面的估计。

为了正确认识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大作用和中国现代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意义，推动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既要充分估计解放区战场的伟大作用，也应对国民党战场作恰如其分的估价。本文主要是对国民党战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尝试性的实事求是的初步探讨。

为了便于探讨问题，我们根据抗战的三个不同的阶段进行探讨。

二、抗战初期国民党战场的积极抗战

芦沟桥事变的第二天，即七月八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著名的“七八抗战宣言”，号召全国同胞团结起来，“驱逐日寇出中国！”“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

从此，全国人民特别是平津地区，便掀起了军民共同抗战的热潮。

在日本侵略者的进攻西前，在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抗日的情况下，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不得不表示对日作战。

七月十二日，蒋介石致电北平驻军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命令他“就地抵抗”，同时又命令中央军集中在保定，并派参谋次长熊斌北上，向宋哲元传达中央旨意，即：“不挑战，必抗战”，“在

不丧失领土主权原则下与日本谈判。⑯”这表明蒋介石一方面要对日作战，另一方面又想通过和谈解决战争。

然而，日本帝国主义的气焰是十分嚣张的，根本对和谈不抱诚意，反而加强对平津的进攻。七月十七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讲话：一、重申中国政府外交政策，即是他任国民党“五大”外交演词和“五大二中全会”对“最后关头的解释。他说：“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能牺牲到底，抗战到底；二、芦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三、万一到了无法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四、在和平根本绝望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办法，求得芦事的解决。”他还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⑰

虽然蒋介石的谈话比过去强硬，但是，他仍幻想和谈解决。他先后会见英、美、法、德等国的驻华大使，希望他们出面调停，同时，指示宋哲元多次与日本侵略者进行谈判。然而，日本侵略者表面上进行和谈，实际上早就制定出了先攻平津，再占保定一带，然后在石束庄，德州铁路一线同中国军队作战的侵略计划。大批日军源源来到之后，于七月二十五、二十六日，向廊坊和广安门发动猛烈进攻，二十八日向北平中国驻军发起总攻，中国军民英勇抗战，副军长佟麟阁和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阵亡。七月二十九日，日军控制了北平，次日又攻入天津。

平津战事激烈进行的时候，蒋介石于七月二十九日召开特别会议，当晚向记者谈话，声明庐山谈话的四点立场“绝无可以变更”

认为：“今既临此最后关头，岂能忽视平津之事为局部问题，任听日军之宰割，或更制造傀儡组织。政府有保卫领土主权与人民之责，惟有发动整个之计划，领导全国一致之奋斗，为捍卫国家而牺牲到底！此后决无局部解决之可能。国人须知，我前次所举之四点立场，实为守此则存逾此则亡之界限！无论现实我军并未知如何失败，即使失败，必存与国同尽之决心，决无妥协与屈服之理。总之，我政府对日之态度始终一贯，毫不变更，即不能丧失任何领土与主权是也，余已决定对于此事之一切必要措置。⑮”

日本侵略者并不以占领平津为满足，于八月十三日，向上海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妄图一举攻占这个著名的国际都市。这就直接侵害着国民党四大家族的经济中心，严重地威胁着蒋介石的统治。全国人民的抗战情绪也异常高涨，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不得不进行比较积极的抗战。

八月十四日，蒋介石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表示“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若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⑯”接着国民党将南北战场划为五个战区，上海为第三战区，蒋介石自兼司令官，制定了作战方案，在上海进行了激烈的战斗。

日本侵略者动用了多达20万以上的兵力，外如38艘军舰和大量飞机，大炮向上海发起猛烈进攻，国民党军队在上海人民的支援下，英勇战斗，顽强拼搏，战斗十分激烈，有不少感人的场面，在保卫宝山阵地的战斗中，营长姚子香，带领全营战士，坚守阵地顽强战斗，一天之内打退敌人数十次进攻，苦撑二十余日，最后弹尽粮绝，全营将士以身殉国，壮烈牺牲；在保卫大场的战斗中，三月之内，敌飞机172架进行轮番轰炸，投弹2,526枚，重160

吨。但是，保卫大场的勇士们仍然顽强阻击敌人。在坚守四行仓库的战斗中，副团长谢晋元率领“八百壮士”，一直坚守住了阵地，给日寇以沉重打击。上海军民的英勇战斗，直接打破了日寇十天占领上海的狂妄计划。到十一月十二日，日寇虽然占领了上海，但是在这长达三个多月的战斗中，日寇伤亡惨重，根据日本自己的统计，被打死打伤者共达 40,372 人。

日本在平津得手后，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指挥，纠集 20 万侵略军，沿平绥路分三路向山西进犯。

国民党蒋介石任命阎锡山为第二战区司令官，指挥山西作战，这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也以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的战斗序列参加了山面作战。

战斗在八月上旬打响后，南口一战十分激烈。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与日本精锐的坂垣师团交锋，一举消灭日寇 1000 多人，缴获大量的枪支弹药，这是中国全面抗战以来的第一次大胜仗，也是当年国民党所称道的一次胜利^②。

日寇于十月中旬，集中五、六万兵力向忻口猛扑，我守卫部队，英勇作战，多次主动出击，歼敌 20,000 余人，国民党第九军军长郝梦龄，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麒在战斗中壮烈殉国。十一月九日，日军占领太原。至此，长达三个多月的山西战役结束。

一九三八年三月，日寇以 20 万兵力，分南北两路向徐州夹击。

在徐州会战中，国民党动员了 60 万兵力，由第五战区司令官李宗仁指挥与日寇作战。在滕县的战斗中，川军师长王铭璋以身殉国。在台儿庄的战斗中，池峰城师长率领全体官兵，在缺乏空军和炮兵掩护的不利条件下，垒石为堡，浴血奋战，在台儿庄失陷四分之三，守军伤亡十分之七的情况下，仍坚守阵地。四月三日夜，池

师长组成数百人的敢死队，手持大刀，夜袭敌人，一举夺回失去的阵地。敌人伤亡惨重，不得不退却逃跑。台儿庄战役以胜利而结束。据日方统计，日寇伤亡12,184人^①。后来，日寇虽然于五月十九日占领了徐州，但伤亡是很大的，仅据日方明显是大大缩小的统计，仅日寇第二军就被打死7,452人^②。

国民党政府针对日寇进攻武汉的行动，提出了保卫大武汉的口号，由第九战区司令官陈诚指挥。六月十二日，战斗首先在安庆、九江地区打响。经过四个月的长期激烈作战，日寇于十月二十七日占领了武汉。此役，日寇自己统计死伤21,886人。

以上几次大的战役表明：

一、在抗战初期阶段，国民党政府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对日作战是比较积极的。国民党军队在这些战斗中付出了重大的牺牲，也比较大量地消耗了日寇的兵力。国民党正面战场的积极战斗，解放区战场的敌后游击战的开展和根据地的建设，共同粉碎了日寇速战速决的企图，迫使敌人改变战略战术，促使抗日相持阶段的早日到来。

二、国民党能够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内连续组织大规模的分别坚持了三、四个月之久的几次会战，贡献显著，证明中国共产党倡导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是完全正确的。尽管国民党的当权派仍是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尽管国共两党仍然存在着各种政治主张上的分歧，国民党蒋介石也并未放弃反共的根本方针。但是，国难当头，大局为重，一切分歧都可以暂时当作“小异”来对待。在以中国共产党为台柱的全民族抗日高潮中，不但国民党的广大官兵富有爱国热忱，就在国民党的当政者中间，同仇敌愾也成为主流，国民党直接领导的军队和战场的具

体表现是有说服力的。

三、这些会战，除了个别战斗的胜利外，会战本身都是失败的。关于失败的原因，我们不能不归结到当时国民党执行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的错误。但同时，还必须承认中日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①”这个根本特点。这个特点决定战争的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但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力、经济力和组织力当时远远强于中国，使中国不可能速胜，必然要经过持久的艰苦作战。在战争的第一阶段，在正面战场上不能阻止日本占领大批城市和交通线，这是不可避免的。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的错误在于未能使中国抗战扬长避短，缩小抗战初期的损失，如果没有解放区战场中流砥柱的作用，也不能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四、但是，不能因为国民党军队打了败仗而抹杀它初期比较积极的抗日行动，在抗战全局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面方作者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如果照他们的说法，那么，欧洲战争爆发后，波兰和法国等很快失败了，岂能说这些国家没有对德国法西斯侵略军作战？事实上他们的著作却大书特书这些国家对德寇作战的业绩。可见，积极作战与打了败仗是两回事。比较而言，在抗战初期国民党所组织的几次战役，在中国近代反侵略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规模也是巨大的。号称欧洲大陆第一号的陆军强国的法国，在战争爆发不到四十天就投降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战争的头五个月中也难免失地于里。英法虽然对德宣战，却出现了长达八个月之久的奇怪战争，哪里有象中国国民党所组织的好几次长达三、四个月之久的会战规模呢？由此可见，国民党军队在抗战初期的积极作战，尽管失败了，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反

法西斯谷口^⑤的状况一比，更应该充分肯定。而中国解放区战场的开辟，则是其他各国无法比拟的。

同时，我们也要指出，在抗战初期，国民党蒋介石还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与日本进行和谈，企图以和平方式结束中日战争。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日，陶德曼向蒋转达了日本和谈的七个条件，主要内容是：内蒙建立自治政府，华北由日本人管理，上海由国际警察管制，停止排日、共同反共等^④。蒋没有贸然接受。他说：如果他同意了这些条件，“中国政府是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的，中国会发生革命”，又说“中国政府倒了，那么惟一的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将会在中国占优势，但是，这就意味着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议和，因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⑤十二月二十三日，日本通过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向中国提出了不能更改的和谈条件：一、中国政府必须放弃联共、反日、反满政策，与日满共同反共；二、在中国必要区域设立非军事区及特殊政权；三、中日满缔结密切之经济合作的协定；四、中国偿付日本要求的赔款，限令在三八年一月十五日以前答复。^⑥对日本最后通牒的灭亡中国的条件，正如蒋介石前面所说，他慑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决反对，全国人民抗日运动的高涨，不敢答应。日本政府于一月十六日发表声明：“日本政府今后不与国民政府为对手，期望真能与日本提携之新政府成立且发展，而拟与新政府调整两国国交，并协力建设新中国。”^⑦中断了这次谈判。

这次谈判和中断，表明蒋介石对抗战的被迫性和动摇性。但对日积极作战毕竟是国民党在抗战初期阶段的主流。正如毛泽东所说：“这一时期内，国民党政府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这一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重点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这样就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勃勃的新

气象。”^②

三、抗战中期国民党战场的消极抗日

武汉失守后，日本侵略者虽然侵占了大片土地，但是，由于中国人民的坚决抗战，对它的打击是异常沉重的，兵力被大量消耗，财政出现竭蹶，租税加重，日本人民厌战情绪增长，况且，占地太多，战线太长，这就分散了本来就有限的兵力。加上蒋介石没有投降，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开辟大量的抗日根据地，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这就迫使日本侵略者，不得不改变原来的侵略方针，采用新的侵华策略。其中包括：一、对国民党改为以诱降为主，进攻为辅的方针；二、以“反共”为诱饵，破坏国共合作，瓦解抗日力量；三、利用沦陷区的人力、物力，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四、向英美妥协让步，通过英美出面调停压迫国民党投降。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三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帝国所望于中国者，在求共肩建设东亚新秩序之任务”，“至于国民党政府，倘能抛弃从来错误政策，另由其他人员从事更生之建树，秩序之维持，则帝国亦不事拒绝。”^③这个声明虽然修改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主张，但是，要另由他人来取代蒋介石，当然蒋介石是决不能接受的。日本政府又以近卫首相的名义于十二月二十二日再次发表声明，说什么：“一、中国放弃抗日，与满洲国建立外交关系；二、中日缔结‘防共协定’，在协定有效期间，日本可以在指定地区驻兵，而内蒙作为特殊防共地域；三、中日提携，中国应承认日本臣民在中国内地居住营业之自由，特别给与日本在华北与内蒙以开发资源之便利。”^④这个声明对国民党政府的诱降程度显然是进了一步，但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蒋介石本人的地位问题，日

本人没有明确表态，这当然也是谈不成的。到了一九三九年三月，日本新任内阁首相平沼在国会演说中提出：“蒋介石将军与其领导之政府，假使能重新考虑其反日态度，与日本共同合作，谋求东亚新秩序之建立，则日本准备与之作中止敌对行为之谈判。○”平沼的讲话，不但承认了国民党政府，也承认了蒋介石的领导地位，只要不抗日，就可以合作。这表示日本决心招降蒋介石。同时，在日本的协迫下，英美等帝国主义积极策划远东慕尼黑阴谋，妄图把中国变成捷克。在日本招降，英美劝降的情况下，蒋介石国民党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召开五届五中全会，确定政策重点，由对外转向对内，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路线。使相持阶段的国民党战场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首先是从比较积极的抗日，转变为比较积极的对日谈判。

武汉失守后，蒋介石于一九三八年十月，主动写信给美国总统罗斯福，要他出面调停中日战争，同时，也请英国出面斡旋。罗斯福未作积极反应，英大使卡尔却从上海于十一月初到长沙与蒋介石面谈条件。

一九三九年九月，欧洲战争爆发，国际形势发生很大变化，蒋介石政府又要求美国出面调停。九月二十八日，外交部长王宠惠对美国合众社远东部经理毛勒士发表了“希望爱好和平的国家如美国能促成调停○”的讲话。一些国民党要员如张群等也纷纷潜赴香港，作寻求“和平”的试探。甚至还提出只要英美等国出面调停，国民党政府愿意提供20万兵员以供英美使用○。

欧战爆发后，德国取得一些暂时性的胜利，蒋介石又请求德国出面调停。许诺德国，如能调停成功，不仅让德国在华北享有经济的优越地位，而且还愿意与德、日一起实行反共政策，参加欧战。

孔祥熙表示愿意并保证对德国提供原料50年，把准备给英国的钨、锑和锡供应给德国。

蒋介石还直接派亲信与日本谈判。一九三九年九月，铃木卓尔中佐与在香港的蒋介石的内弟宋子良进行秘密谈判。一九四〇年九月，近卫再次组阁后，双方约定于长沙会谈，日方是参谋总长板垣、今井武夫，中方有蒋介石等。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珍珠港事件之后，蒋介石一方面追随美国正式对日宣战，以此再次表示抗战决心，借以向美英索取援助，另一方面仍暗通敌伪，以此缓和敌人的进攻。

一九四二年三月，一个日本混人叫黑田的从桂林秘密到达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谈判条件是：一、蒋介石还都南京；二、汪精卫主持华北；三、日本占据广州、上海等地^③。从此以后，日蒋谈判就更加积极起来。一九四三年，日军参谋小林少将，国民党组织部副部长吴开先继续会谈。后来，汉奸汪精卫、周佛海等人也先后与日蒋的代表多次会谈。

应该怎样看待国民党与日本在这阶段的谈判呢？

首先，应该分清谈判与投降的关系问题。一般说来，谈判和投降并不是一回事，谈判不一定就意味着投降。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各式各样的谈判；有的确实是通过谈判达到投降；有的是通过谈判解决争端，在双方都有利的情况下解决矛盾，不是谁投降谁的问题；有的谈判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即是达成了一大堆协议，但是事后双方都没有执行。实际上，谈判应该是一种斗争方式，应该容许通过谈判，双方交换意见，互相摸底；对各种各样的谈判应该具体分析，不仅要谈谈判的客观背景，谈判的内容要进行分析，而且，也要对谈判的结果和影响加以研究。

其次，日蒋的谈判，从日方来讲，是想通过谈判压迫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投降，以便早日结束战争，实现它的北攻苏联，南进英美，建立大东亚帝国的目的。从蒋介石来说，一方面在日本大军压境，战争不断失败的情况下，想通过谈判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从根本上又不愿意投降，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及其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队伍，坚决抗日，反对投降，在战场上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抗日力量越来越壮大。面对这种情况，蒋介石是不敢通过谈判投降日本的。

第三，蒋介石与汪精卫是不同的，汪精卫是通过谈判投降了日本，而蒋介石却没有投降。

第四，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在日蒋谈判期间，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给抗战事业造成极大危害。

在相持阶段中，国民党战场出现的另一个变化就是从比较积极抗日转变为比较积极的反共。

在抗战相持阶段中，蒋介石国民党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

第一次，从一九三九年五月到一九四〇年三月，蒋介石指使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等地发动的进攻。

第二次，从一九四〇年十月至一九四一年三月，蒋介石掀起了以皖南事变为主要标志的反共高潮。

第三次，一九四三年，蒋介石趁共产国际解散之机，也要求解散中国共产党，同时调兵向边区进行挑衅。

怎样看待国民党发动的这三次反共高潮呢？

第一，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对内屠杀中国共产党人，残酷剥削中国劳苦大众，实行法西斯式的独裁统治，对外联合帝国主义，反苏反共，成为地地道道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代表。反共这

是蒋介石国民党右派的一贯政策。

第二，芦沟桥事变之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日本的侵略，严重地威胁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因此，他宣布抗日。但是，到了武汉失守之后，日本采取侵华新策略，把侵略的主要矛头指向敌后战场，对国民党采取诱降为主的方针。这样，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的压力相对减轻，这样，蒋介石国民党就能够集中它的嫡系部队去围攻边区，掀起反共高潮。

第三，蒋介石国民党反共，还是有一个限度的。这个限度就是不破裂国共统一战线，还是打起抗日招牌。他诬蔑共产党搞割据，诬蔑共产党“不抗日”“不服从中央命令”等等罪名，加以围剿。当他的这些阴谋手法被揭穿，反共军事行动被粉碎后，不得不发表善后讲话。比如，在第二次反共高潮被粉碎后，蒋介石不得不发表公开讲话，说什么新四军事件完全为整肃军纪，当然不牵涉其他问题。还说什么“凡遵令抗战建国纲领之一切个人、团体和党派，政府绝对尊重其应有之自由与独立之人格，而予以法律之保障。”并且，在一九四一年三月六日的国民党参政会上，不得不表示“保证以后决无剿共的军事”，在这次会上，仍然造出董必武同志为参政会常驻委员。蒋介石还约请周恩来同志谈话，表示许多具体问题如：释放被扣人员，可以继续谈判及减轻对《新华日报》的压迫等进行谈判解决。这些都表明蒋介石国民党不敢一意孤行，不敢公开破裂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而是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做法。

第四，中日民族矛盾始终是主要矛盾，日本走亡我之心不死，直接威胁到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生存。尽管日寇洞悉国民党的反共方针决不放弃，而提出“共同防共”来诱降国民党。然而，蒋介石深知日本的反共和他的反共目的有根本的差别。一九三八年十二月

二十六日，蒋介石发表演讲，驳斥近卫第三次声明时说：“所谓共同防共，目的本不在防共，也不在防俄，而实在借此名义以防华。”“日本真正所欲，乃在整个吞并我国家与根本消灭我民族。”所以蒋介石反共是有一定限度的，没有丢掉抗战这块牌子。

第五，中国共产党又联合又斗争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正确贯彻执行，这是蒋介石国民党没有公开破坏国共合作，反共仍有一定限度的主要因素。

另外，我们还必须指出，在这一阶段中，蒋介石对日作战是十分消极的。据战后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陈诚编写的《八年抗战经过概要》的统计，抗战八年，国民党战场先后进行大规模的“会战”二十二次（其余大小战斗约四万次）除山南忻口会战外，其余三次每次参战的国民党军队都在三十个军以上，参加武汉会战的达四十七个军。自一九三九年一月到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五年间，先后举行的会战十三次，参战的国民党军队最多的一次是十九个军（一九四二年五——八月的浙赣会战），前后对比，对抗战的积极和消极的区别是明显的。自日寇占领武汉、广州以后，在战线过长，兵力不敷的条件下，军事上改变为以巩固占领区为主，以主要兵力对付解放区战场，对国民党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对国民党战场只实行局部的、间断的战役进攻。在国民党仅抱消极应战，而不积极反攻的情况下，会战的次数少，规模小便是当然的了。但应该看到，在许多会战中，国民党广大官兵仍然英勇作战，打退了日寇的攻势，基本上守住了战线，到达了坚持全国抗战的效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成为在远东最后打败日本唯一可靠基地。这不但是中国解放区战场坚持和积极发展的结果，也是国民党战场虽然消极，但毕竟坚持下来所起的作用。